

# 蒙古史研究

## 參考資料

第六輯

1976年3月

内部参考 请勿转载

### 目 录

|                        |                    |
|------------------------|--------------------|
| 巴托尔德传·····             | [苏]伊·彼特鲁舍夫斯基 (1)   |
| 九卷本《巴托尔德文集》简介·····     | [苏]《亚非民族》编辑部 (8)   |
| 符拉基米尔佐夫传·····          | [苏]恩·普·沙斯契娜 (11)   |
| 符拉基米尔佐夫学术著作表·····      | [苏]恩·普·沙斯契娜 (17)   |
| 符拉基米尔佐夫在蒙古史方面的著作·····  | [苏]格·恩·鲁绵采夫 (23)   |
| 有关符拉基米尔佐夫的文献表·····     | [苏]恩·普·沙斯契娜 (50)   |
| 伯希和传·····              | [法]罗图尔 (53)        |
| 田清波传 (附: 田清波的著述) ····· | 《华裔学志》编辑部 (62)     |
| 谢·符·吉谢列夫略传·····        | [苏]莫斯科大学考古教研室 (66) |

內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印

# 巴托尔德传<sup>①</sup>

〔苏〕伊·彼特鲁舍夫斯基

瓦西利·符拉基米罗维奇·巴托尔德于1869年11月3日（15日）生于圣彼得堡的一个俄国化的德国人的家庭里；父亲的祖籍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母亲的曾祖父，一位路得派新教的牧师，从汉堡迁居到俄国，巴托尔德的父亲是交易所的经纪人。巴托尔德在自己的《自传》<sup>②</sup>中指出，父亲的财产没有为儿子们所保留，1917年伟大的十月革命后，“父亲的子女们，谁也没有成为迁居他国的人。”但是在幼年 and 青年时代，家庭的物质富裕使巴托尔德有可能受到多方面的社会教育，其中包括很好地学会古代经典语言和基本的西欧语言，也使他可能为自己选择从学生时代起就吸引了他的专业——历史学。1887年，巴托尔德毕业于圣彼得堡的一个八年制文科中学时，获得了金质奖章。在选择古希腊罗马史和中近东各国史之间犹豫了一阵后，巴托尔德决定献身于后者，同年，1887年秋天，他进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阿拉伯—波斯—土耳其—鞑靼语专业。

---

①参阅：巴托尔德：《自传》，载《火星》杂志1927年第40期，巴托尔德：《科学院正式院士传记辞典资料》，第一编，彼得堡，第19—24页；伊·克拉奇科夫斯基：《悼念瓦·符·巴托尔德》，载《红色报》，列宁格勒，第197（2555）号，1930年8月21日（晚上发刊）；尼·雅·马尔：《瓦西利·符拉基米罗维奇·巴托尔德》，载《国立物质文化史学院通报》1931年第1期第8—12页；伊·伊·乌姆尼亚科夫：《瓦·符·巴托尔德，三十年的教授工作》，载《国立中亚大学通报》第14期，塔什干，1926年，第175—206页，姆·多斯托耶夫斯基：《回忆中的巴托尔德，性格描述的尝试（德文）》，《伊斯兰教世界》，第12卷，1931年，第89—136页；伯希和：《巴托尔德》，载《通报》第27卷，1930年，第458—459页。有关巴托尔德的其他著作，参阅伊·伊·乌姆尼亚科夫编的正在印刷中的《巴托尔德院士著作录》（第七编）。

②载《火星》杂志，1927年第40期。

在大学生时代,巴托尔德深入地学习掌握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但是最使他醉心的是中近东各国的中世纪史。当时,东方学的这个分支在系里与语文学相比只占有第三等的位置。巴托尔德后来指出:在系里,“只有一名教师,即维谢洛夫斯基教授讲授东方学,他讲授一门共同课:西欧人旅行东方史,此外,还讲授几门有关中亚历史的课程。”<sup>③</sup>恩·伊·维谢洛夫斯基教授(1848—1918年)讲授东方史课时,使巴托尔德有充分自由来选择课业范围。巴托尔德的真正的学术指导者是维克托尔·罗曼诺维奇·罗津(1849—1908年),一位卓越的多方面的学者。<sup>④</sup>罗津是一位热情的俄国爱国者(尽管他的祖籍是外国),他相信俄国东方学有远大的未来<sup>⑤</sup>,狂热地献身于培养年轻东方学家的事业。<sup>⑥</sup>据巴托尔德自己说,他“在大学的课业中,跟当时其他年轻东方学家一样,多半处于天才的、精力充沛的阿拉伯学家教授罗津男爵的指导下,他使新进的东方学家围拢在自己身边。”<sup>⑦</sup>在大学里,巴托尔德同突厥学家普·姆·密利奥兰斯基(1868—1906年)的关系也很密切,又,尽管年岁和地位不同,他也尽可能地同突厥学家符·符·拉德洛夫院士(1837—1918年)<sup>⑧</sup>相接近。

在大学里巴托尔德就已致力于科学研究工作。1889年,巴托尔德以《论中亚的基督教》这部著作荣膺系里的银质奖章<sup>⑨</sup>。1891年大学毕业后,为了提高学业水平,巴托尔德听从罗津的劝导于1891—1892年自费旅行国外,游历了芬兰、德国、瑞士、意大利北方、奥地利、匈牙利和克拉科夫<sup>⑩</sup>。在哈勒的大学里,他听了伊斯兰学家奥古斯特·缪勒(1848—1892年)的讲课,后来他亲切地回忆起缪勒,把他当作自己的一位老师,在

---

③见《自传》。

④参阅《维·罗·罗津纪念文集》,伊·尤·克拉奇科夫斯基编,莫斯科—列宁格勒,1947年(特别是阿·尤·雅库博夫斯基的论文《历史学家维·罗·罗津》)。

⑤如:罗津是召开1876年圣彼得堡举行的第三次国际东方学家会议的首倡人之一。

⑥想提高俄国东方学的国际意义,罗津要求自己的学生不顾当时在西欧占统治地位的偏见:“不读用俄文写的书”,用俄文刊行自己的著作。

⑦《自传》。

⑧同上。

⑨以《论蒙古以前时期突厥斯坦的基督教》为书名刊行于1893年(《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集刊》第8卷)。但巴托尔德第一部刊行的著作是论文《披萨人伊索勒》(《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集刊》第6卷,1892年)。

⑩当时克拉科夫位于奥匈帝国内。

斯特拉斯堡大学他听了有名的阿拉伯学家帖奥多尔·尼奥勒德克（1836—1930年）<sup>⑪</sup>的讲课。返回祖国后，巴托尔德被留在圣彼得堡大学“准备讲授东方史的教授学衔”（1892年）。1893年，他通过了硕士学位的考试<sup>⑫</sup>。1896年，获得副教授学衔后，他开始在圣彼得堡大学讲课<sup>⑬</sup>，他的某些讲课稿后来出版了。1897—1901年，巴托尔德也是圣彼得堡大学明茨研究室的主持人。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巴托尔德对大量原始资料（大部分是未刊行的）进行浩繁工作的年代，在研究这些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他在九十年代写成了他的主要的巨著《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sup>⑭</sup>。他于1900年秋天将这部著作提交东语系作为谋获硕士学位的论文，但在进行论文答辩后，巴托尔德荣膺大学的最高学位——东方史博士学位<sup>⑮</sup>。

1901年起巴托尔德任圣彼得堡大学额外教授，1906年起任该校额内教授。1906年到1910年，他是东语系的秘书。1910年，他被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1913年10月12日被选为院士。1905—1912年，他是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的秘书，1908—1912年，他是《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集刊》的编辑<sup>⑯</sup>。巴托尔德还在俄国地理学会工作过，例如曾担任过该学会出版的伊·普·米纳耶夫的《马可波罗行记》俄译本的编辑<sup>⑰</sup>。1912年，他是伊斯兰教学方面的学术杂志《伊斯兰教世界》<sup>⑱</sup>的创办人之一和编辑。第一卷出版后，巴托尔德很不客气地拒绝了内务部长马卡罗夫指示的将杂志从客观的、纯学术的机关刊物转为沙皇政府民族殖民政策喉舌的要求，由此被赶出了编辑部。巴托尔德是1903年创设的俄国研究中东亚委员会的两个秘书之一；据巴托尔德说，委员会存在的全部时期内的所

---

⑪顺便说一下，尼奥勒德克是俄国科学院的院士（1885年起为通讯院士，1927年起为名誉院士。）

⑫当时“留在大学里准备教授学衔”的研究班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而硕士考试相当于现在（按专业的）候补博士考试。

⑬以《成吉思汗帝国的建立》（1896年出版，《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集刊》第10卷）为题进行试讲。

⑭1898—1900年出版于圣彼得堡（第一篇——正文，第二篇——研究性著作）。

⑮详见《巴托尔德文集》第一卷序言。

⑯《集刊》为1886—1921年出版的不定期刊物，为俄国东方学家的主要的学术机关刊物；其创办人与领导人为罗津（到他1908年去世为止）。

⑰1902年圣彼得堡出版（参阅《巴托尔德文集》第一卷末尾的书目）。

⑱东方学会的刊物。

有记录都是他一个人写的。<sup>①⑨</sup>

巴托尔德多次到中亚进行学术旅行，以便到抄本藏库工作或进行考古工作；1893—1894年巴托尔德由圣彼得堡大学和科学院派遣前往中亚，1902年由圣彼得堡大学派往中亚，1904年，由俄国研究中东亚委员会派遣去撒马尔汗进行发掘<sup>②⑩</sup>，1916年，又一次去撒马尔汗进行发掘。巴托尔德写道：“在我去中亚的所有各次中，最成功的是1902年那次，当时我除去熟悉手抄本文献外，别无其他任务。在东方史领域里，有那么多无人利用过的资料，在阅读手抄本时常感受到在旧址上进行发掘时发现了新世界的拓荒者的那种喜悦”<sup>②⑪</sup>。巴托尔德还于1900年到高加索，1908年到高加索的阿尼进行学术出差。巴托尔德经常出国：1895年他曾去巴黎、伦敦、牛津、荷兰，1898年去德国，1905年去德国、奥国、的罗尔、瑞士，1906年去奥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土耳其、埃及，1908—1909年去意大利（到那坡利为止）、布达佩斯，1909年去芬兰，1911年去爱尔兰、北美、德国、法国，1912年去维也纳、丘宾根、汉堡、律贝克，1913年去瑞典、丹麦、英国、直布罗陀、土伦、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巴托尔德的特点是工作能力很强。他既从事教育工作，又参加学术团体的工作和编辑杂志，但他把研究工作视为主要工作<sup>②⑫</sup>。巴托尔德研究伊朗史、外高加索各国史、阿拉伯各国史，突厥诸族史、蒙古史、伊斯兰教学，但他在中亚史方面成就最大。巴托尔德继承了他的前辈符·符·格里戈里耶夫和恩·伊·维谢洛夫斯基开始的中亚史研究的传统。巴托尔德在中亚展开了广泛的学术性社会活动，他同方志学家保持联系，他参加了突厥斯坦考古爱好者小组（1895—1917年）<sup>②⑬</sup>的工作，参加编辑《突厥斯坦报》、《边区》、《俄国突厥斯坦》等地方机关刊物。巴托尔德很紧张地展开科学研究活动<sup>②⑭</sup>。二十世纪一十年代时，巴托尔德在中世纪东方学上的权威地位已为国内外所承认。

---

<sup>①⑨</sup>见巴托尔德：《回忆斯·姆·都宾》，载《苏联科学院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文集》第9卷，1930年，第350页注1。

<sup>②⑩</sup>据巴托尔德说，他之参加发掘，是“不无拉德洛夫的影响”的（《自传》）。

<sup>②⑪</sup>《自传》。

<sup>②⑫</sup>同上。

<sup>②⑬</sup>参阅勃·符·鲁宁：《俄国东方学史与突厥斯坦考古史略述，突厥斯坦考古爱好者小组（1895年—1917年）》，塔什干，1958年。

<sup>②⑭</sup>到1913年为止，巴托尔德共发表了150种以上的著作，其中不算为百科全书撰写的辞条。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巴托尔德的学术性社会活动和学术组织工作大为扩展。他是科学院东方学委员会的常务主任，他参加过塔什干国立中亚大学的筹建工作，他是拉德洛夫东方学家协会的领导人（从1918年起），后来又是突厥学研究室的领导人（1928—1930年）、国立物质文化史学院的副院长、学术杂志《伊朗》<sup>②⑤</sup>及科学院其他刊物的编辑。巴托尔德完成了苏联政府所交给的在苏联东方各共和国创立东方史讲坛、学术图书馆、手抄本藏库和博物馆等任务。二十年代时，巴托尔德在重建的列宁格勒现代东方语学院以及列宁格勒其他高等学校继续从事教育工作。1920、1927和1928年，巴托尔德到中亚去进行学术出差。他应地方组织的邀请到莫斯科、巴库（1924年）<sup>②⑥</sup>和塔什干（1925和1927年）的大学里讲课；1925年巴托尔德去过塔什干、撒马尔汗、布哈拉和沙赫里夏勃兹，1927年去过塔什干、布哈拉和希瓦。1926年3月，巴托尔德参加了在巴库举行的全苏第一届突厥学家代表大会的工作。1926年在塔什干庆祝他答辩博士论文25周年<sup>②⑦</sup>和从事教育工作30周年（1896—1926年），并试图对巴托尔德在这段时期内的学术作品做一个总结<sup>②⑧</sup>。

革命后巴托尔德也曾出过国：1917年他曾去芬兰，1922—1923年曾去芬兰、牛津、伦敦、比利时、荷兰、德国。1923年，巴托尔德作为俄罗斯科学院的代表参加了布鲁塞尔国际史学家代表会议的工作。在伦敦，他在皇家学会举行了突厥史和蒙古史方面的讲座；同时他同赫·阿·尔·吉布一起准备他的巨著《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的英文版<sup>②⑨</sup>。1926年，应土耳其政府的邀请，他去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讲课<sup>③⑩</sup>，1929年，他曾去到德国（柏林、汉堡、哥廷根）。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巴托尔德仍然积极努力地从事研究工作。除大部头学术

---

<sup>②⑤</sup>出版过三卷（列宁格勒，1927—1929年）。

<sup>②⑥</sup>以《里海沿岸各州在伊斯兰教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为题的讲座，1924年讲授于国立阿塞拜疆大学（巴库），1925年于巴库刊行。

<sup>②⑦</sup>为庆祝巴托尔德答辩博士论文25周年，出版了一部用阿拉伯文“珍珠项链”为标题、副标题为“突厥斯坦的朋友、学生和景仰者献给巴托尔德”的论文集。

<sup>②⑧</sup>所指的是为庆祝巴托尔德担任教授30周年，伊·伊·乌姆尼亚科夫在《国立中亚大学通报》1926年第14期上所发表的《瓦·符·巴托尔德，三十年的教授工作》一文（参阅书目）。

<sup>②⑨</sup>1928年出版。

<sup>③⑩</sup>巴托尔德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所举行的中亚突厥诸族史方面的讲座，1927年以土耳其文刊行，后来1935年以德文刊行，1945年出版过修改本的法译本。

著作外<sup>③</sup>，巴托尔德还发表了一系列科学普及著作，如：《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文化》（这两篇都写于1918年），《突厥斯坦史》（1922年）<sup>④</sup>，《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1927年），以及塔吉克人史纲（1925年）、吉尔吉斯人史纲（1927年）<sup>⑤</sup>、土库曼人史纲（1929年），这几部史纲开辟了这些民族历史研究上的新阶段，当时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几乎尚未作过深入研究。伊·尤·克拉奇科夫斯基院士论及巴托尔德的科学普及著作时写道：“这些著作在方针上是普及的，但也使专家们获益甚多，因为这些著作不仅概括了所作出的科学结论，而且也介绍了作者本人在研究中的重要成果、收获。”<sup>⑥</sup>在1892—1930年期间，巴托尔德的学术著作一共出版了400多种；他的若干著作则是死后出版的<sup>⑦</sup>。他的许多著作被译成外文（其中包括土耳其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在国外出版。巴托尔德也是为《伊斯兰教百科全书》撰写了很多辞条的撰稿人，他为该辞典撰写了246篇辞条。

巴托尔德的晚年生活由于他所爱的妻子玛丽雅·阿列克塞芙娜<sup>⑧</sup>1928年5月的突然去世而变得阴郁起来。巴托尔德的私人生活与她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没有子女）。他没比她妻子多活多久。1930年8月19日，他因肾脏病在列宁格勒附近的疗养院去世，享年六十一；他被葬在列宁格勒斯莫棱斯克墓地，与他的妻子合葬在一个墓里。

尼·雅·马尔院士在苏联科学院举行的纪念巴托尔德的会议上讲到他时说：“他是对抽象科学有坚强信念、坚定不移的人，在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中他也同样地如此。人们对最最好心肠的瓦西利·符拉基米罗维奇畏之如火；他对人真心实意，没有多余的话，对反对者也如此；对任何人都不虚伪做假，不管是谁都当做自己的亲兄弟看待……在社

---

<sup>③</sup>其中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兀鲁伯及其时代》（彼得格勒，1918年）和《米尔阿里失尔与政治生活》（载于文集《米尔阿里失尔》中，列宁格勒，1928年）。

<sup>④</sup>为1920年在国立中亚大学（塔什干）举行的讲座。

<sup>⑤</sup>第二版出版于1943年。

<sup>⑥</sup>伊·尤·克拉奇科夫斯基：《俄国阿拉伯学史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第224—225页。

<sup>⑦</sup>参阅本卷末尾的书目。

<sup>⑧</sup>玛丽雅·阿列克塞芙娜，娘家姓茹科夫斯卡娅，是有名的俄国伊朗学家瓦连季纳·阿列克塞维奇·茹科夫斯基教授（1858—1918）的妹妹。瓦·阿·茹科夫斯基的另一个姊妹阿历山大·阿列克塞芙娜是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马尔院士（1864—1934年）的妻子和苏联伊朗学家尤里·尼古拉耶维奇·马尔教授（1892—1935年）的母亲；死于1939年。

会生活中盛行伪善虚礼的旧日生活中，瓦西利·符拉基米罗维奇处境很难，一点也不愉快，在社会上是孤独的，没有成伙的朋友。但相反地从很远的地方人们趋向于他。”<sup>②⑦</sup>经常趋向巴托尔德的是一些青年人、学生、地方上的方志学者以及苏联东方各共和国的学术工作者和新建立的学术机关的创办人。对待他们所有的人，瓦西利·符拉基米罗维奇总是关切地、有求必应地、始终不渝地准备将自己广博的知识和学术经验慷慨地授与。巴托尔德外表严峻而同时令人神往，对待学生有严格原则性、要求严格而同时善意待人、关怀倍至，他对待人总是极其真挚、直率、不因人而异，他不能容忍任何不公正的事以及在革命前的学院界如此普遍的阿谀奉承、个人名利思想和虚伪作风。在大学讲台上，瓦西利·巴托尔德毫不关心讲演的艺术手法。他讲得极为简单，就象跟听众在随便谈话。但是他的独创的课程所具有的特点是：有仔细的教学准备、透彻的分析，有丰富的从史籍中摘出的材料和对陈旧见解的尖锐批判。这位对自己的国家和苏联科学贡献了如此丰富的著作遗产的优秀人物和卓越学者的面貌就是这样的<sup>②⑧</sup>。

（余大钧译自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版《巴托尔德文集》第1卷，第14—21页。）

---

<sup>②⑦</sup>《国立物质文化史学院通报》，1931年第1期，第8页。

<sup>②⑧</sup>作者写这篇传记时，除上引有关巴托尔德的文献外，还利用了承阿·勒·特罗伊茨基教授殷切地告诉给我们的巴托尔德亲手写的一份完备的科学出差的清单（到1925年为止）。巴托尔德传记的某此细节是符·阿·克拉奇科夫斯基教授、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阿·恩·康农诺夫教授、伊·伊·扎鲁宾教授、符·弗·米诺尔斯基教授、伊·伊·乌姆尼亚科夫教授和格·符·什托夫（巴托尔德的最后一个研究生）告诉我们的。作者谨向以上各位表示深厚的谢意。

# 九卷本《巴托尔德文集》简介

〔苏〕《亚非民族》编辑部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所属东方文献出版社自1962年起陆续出版大东方学家和史学家瓦·符·巴托尔德的文集。

新版《巴托尔德文集》包括他的全部迄今仍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共约550篇专著、论文和书评)。过去用外文出版的著作,将译成俄文收入文集。巴托尔德的著作将根据题目特征分编为各卷。每卷附有索引和报导所研究问题有关新文献的书目、注释。

## 各 卷 内 容

第1卷,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40印张。1962年第3季度出版。

第1卷包括为整个文集写的总序、巴托尔德传略以及他的研究7—13世纪中亚细亚史(从阿拉伯人的征服到蒙古人入侵)的巨著《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本版与此书1898—1900年出版的第一个俄文版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本版考虑到了作者在1928年英文版中所作的修改和补充。作为书的附录,头一次刊布了此书的最后一章《1227—1269年的突厥斯坦》。

第2卷,第1分册,有关中亚细亚史的一般著作;有关高加索和东欧史的著作。55印张。1963年第1季度出版。

此分册包括篇幅较大的如《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谢米列契史纲》、《土库曼族史纲》等著作以及系统叙述中亚细亚各民族史的其他著作。在有关高加索和东欧史的著作当中,有必要指出《里海沿岸各州在“伊斯兰教世界”史上的地位》和《阿拉伯载籍中的俄罗斯人》二文。

第2卷,第2分册,有关中亚细亚史诸问题的著作。38印张。1963年第3季度出版。

此分册包括有关中亚细亚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著作,这些著作研究了与大夏国的形成、中亚细亚的古代宗教崇拜和基督教的传入、阿拉伯人的征服史、蒙古人的入侵和成吉思汗帝国的建立、帖木耳和帖木耳王朝史、中亚细亚的人民运动史、中亚细亚中世纪文化史相联系的许多重要问题。其中包括二部篇幅较大的著作:《兀鲁伯及其时代》以及《米尔-阿里-失尔及其政治生活》。

第3卷,历史地理方面的著作。30印张。1964年第1季度出版。

此卷汇集了许多有关中亚细亚、高加索、伊朗、阿富汗以及近东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著作。其中,《关于咸海和阿姆河下游的报导》、《关于阿姆河流入咸海的河口问题》等文阐明了中亚细亚最大的一条河——阿姆河的古代流向问题。在许多论文和总结性著作《关于突厥斯坦灌溉史》中研究了中亚细亚灌溉网的建立和发展史。还有许多篇研究各城、州历史的论文。

第4卷,有关中亚细亚及其邻国的考古学、题铭学和民族志学的著作。32印张。1964年第2季度出版。

此卷汇集了反映巴托尔德在谢米列契和撒马尔罕进行考古研究的论文,还收进了对阿拉伯、波斯作家关于中亚细亚和伊朗的若干辉煌的古代建筑的报导加以总括的著作。此卷中还收有巴托尔德对中亚细亚和高加索的最令人感兴趣的碑铭所作的研究和译文。在收入此卷的民族志学论文中有:《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埋葬仪式》和《关于中亚细亚的车载马运》。

第5卷,有关突厥、蒙古各族历史和语文的著作。48印张。1964年第4季度出版。

此卷包括有关中央亚细亚、中亚细亚、高加索和东欧的突厥部落和民族的古代和中世纪史的著作,还包括了研究中央亚细亚和远东史的若干论文。巴托尔德的突厥学巨著《中亚细亚突厥史十二讲》头一次用俄文刊布在此卷中,这部著作总结了他在突厥学方面的多年研究。

第6卷,有关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历史的著作。51印张。1965年第1季度出版。

此卷包含有阐明作为宗教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的伊斯兰教的起源,阐明早期哈里发国史、尤其是哈里发国与西欧的相互关系问题,阐明宗教运动和伊斯兰教派史以及伊斯

兰教国家史一般问题的著作。此卷中所收的通俗学术著作《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文化》和《伊斯兰教世界》是巴托尔德的最著名的著作。

第7卷，有关伊朗和阿富汗的历史和语文的著作。28印张。1965年第3季度出版。

此卷包含有研究伊朗语民族古代史、伊朗萨珊王朝、伊朗文化与中世纪早期阿拉伯文化的相互关系、伊朗封建关系和人民运动发展史以及伊朗叙事诗史的著作。巨著《伊朗历史地理概述》在此卷中占有很大篇幅。在此卷中头一次用俄文刊布了《关于早期波斯诗歌问题》等重要论文。

第8卷，史料学方面的著作，50印张。1966年第1季度出版。

此卷包含有研究和记述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突厥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的著作。巴托尔德头一个研究了有关中亚细亚和近东史的文献资料，把这些资料介绍给学术界，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对这些国家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在收入此卷的著作中，有若干篇极重要的研究，如：为10世纪地理学论文《呼都德·阿拉木》的出版所写的序，论文《哈非治阿布鲁及其著作》、《史学家穆谢维》、《1902年前往突厥斯坦的出差报告》、《帖木耳王朝史方面的新的史料》等。

第9卷，东方学史方面的著作。65张印。1966年第3季度出版。

此卷包含有巴托尔德的巨著：《欧洲和俄国的东方研究史》和《彼得格勒大学东语系的活动概述》；在这二部著作里实质上叙述了俄国和西欧的东方学史。收入此卷的许多篇论文论述了俄国东方学在中亚细亚方面的学术活动和研究课题。在16篇为纪念杰出的俄国和国外东方学家而写的传记里，详细地评述了符·尔·罗津、符·符·拉德洛夫、克·格·扎列曼、沙畹、多治、戈勒德采尔、马迦特等最大研究家的活动。

第九卷里附有全部九卷的综合索引。

（余大钧译自《亚非民族》，1962年，第3期，第263—264页）。

# 符拉基米尔佐夫传

(1884—1931年)

〔苏〕恩·普·沙斯契娜

博里斯·雅科甫列维奇·符拉基米尔佐夫去世已经有二十五年以上了。对于评价他的著作对我国东方学（首先是蒙古学）发展上的意义，这二十多年是足够充分的。四分之一世纪提供了我们为客观如实地评价当代大蒙古学家的学术事业所必需的历史展望。须知，绝非学术上的一切东西都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能剩下来的仅是那些足以说明一定发展阶段的性质、能够解决科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东西。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符拉基米尔佐夫的学术事业为学术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定下了现代蒙古学家进行研究所遵循的道路。

符拉基米尔佐夫属于俄国古典东方学派，他是在学术工作中将所研究的民族的历史、民族学、语言和文学的研究联合起来的学者之一。符拉基米尔佐夫是这一学派的辉煌代表；他既是史学家，又是语言学家、民族学家、文艺学家，他在所有这些领域内都同样地杰出。符拉基米尔佐夫以自己的著作大大地发展和深化了蒙古学，以致后来的蒙古学家们研究这门科学的各个部门——历史、经济、文艺学、语言学、民族学和古文字学以及对更狭窄的学科（例如：蒙古近代史或布里亚特方言学）进行专门研究时便容易得多了。

在蒙古语言学领域内，符拉基米尔佐夫的基本任务之一是研究蒙古语言的发展道路，这就提出了蒙古语言的过去与现在的比较史研究问题和历史研究问题的初步规划，这些问题正是今天最大的蒙古学家们的研究课题。符拉基米尔佐夫在蒙古人民的文学和民俗学研究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在他的倡议和他的直接领导下，搜集了珍贵的蒙古、布里亚特和卫拉特民间口头创作的典范作品，后来经他编辑后继续出版了科学院早在革

命前就已开始出版的《蒙古民间文学粹编》丛刊。记录下来的这些典范作品的巨量搜集品迄今远未被全部利用；因此今后这些作品的出版可视为已故院士著作的继续以及我们对蒙古人民创作的优秀作品的深刻的敬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符拉基米尔佐夫关于蒙古文学以及蒙古文学与其他东方民族文学，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文学的关系的著作。

符拉基米尔佐夫对蒙古史的研究作出了特别可贵的贡献，他在研究蒙古史上花费了巨大精力，在他的整个学术活动中他对研究蒙古史表现了贯彻始终的深厚兴趣。在蒙古学的这一部门中，对符拉基米尔佐夫来说最主要和基本的是在历史发展中研究蒙古人的社会制度。为数众多的最初的研究、老一辈蒙古学家们积累起来的大量叙述材料以及蒙古历史编纂学所未曾研究过的文献，在经过仔细的科学分析后，出现了在游牧民族研究史上划时代的《蒙古人的社会制度》一书。符拉基米尔佐夫去世后出版的这一著作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蒙古学的范围，这一著作作为进一步研究过着游牧生活方式的各民族历史奠定了基础。

在符拉基米尔佐夫的学术遗产中有许多篇幅不大、而极为出色的论述蒙古学各方面问题的论文。这些论文是语言学或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论文，在这些论文中叙述的简炼与深刻的内容、卓越的分析，巧妙地结合了起来。这些论文的出现，受到我们苏联和国外东方学家们的重视。

符拉基米尔佐夫著作的影响很大。他的著作不仅一直影响着国内东方学的发展，而且远远地影响着国外，国外用几种文字出版了他的史学著作《成吉思汗传》和《蒙古人的社会制度》的译本。我们有权利认为博里斯·雅科甫列维奇是拥有世界声望的苏联最大的蒙古学家。

在国内（在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地区）、外（在兄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族当中，博里斯·雅科甫列维奇的声望很高。在他的直接影响和学术指导下，实现了创建蒙古各族新文字方面的最重要工作。在培养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蒙古地区的民族学术干部和实际工作干部的组织工作上，巨大的功绩属于他；他的许多著作被译成了蒙语，一整代学者——蒙古民族的代表，以他的著作、在他的指导下培养了起来。

在他去世二十五周年时，蒙古作家们为纪念这位大学者，撰写了文章。

在博里斯·雅科甫列维奇的一生中，社交活动不很多，但他的一生具有特别坚强的

目的性，充满着深刻的内容。“他在一生中最珍惜科学，他把科学理解为节制自己的一切行动的特殊意识方式”<sup>①</sup>。学者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他的全部生活道路，使他能在短短的一生中做出这么多的工作。

1884年7月20日符拉基米尔佐夫出生于卡密涅茨一波多尔斯克城。1904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了彼得堡大学东语系，在该系蒙古语专业中有符·勒·科特维奇、阿·德·鲁德涅夫等有名的蒙古学家担任指导，当代最大的学者巴托尔德、勒·雅·施帖尔恩别尔格、泽尔巴等在该系担任工作，后来符拉基米尔佐夫也在该系讲课指导自己的学生。早在大学生时代，博里斯·雅科甫列维奇就已开始进行对蒙古语民族的外出调查研究。1907年，他前往阿斯特拉罕省卡尔梅克人处，对居住在那里的杜尔伯特人进行了调查。1908年夏，他被俄国中东亚研究委员会派遣到西蒙古对科布多地区的杜尔伯特人进行语言学调查。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这次出差，以及他对杜尔伯特人的语言调查到的情况，奠定了研究西蒙古各族语言学和民族学的基础。1909年符拉基米尔佐夫的最早付刊的著作，便是研究西蒙古的杜尔伯特人的。同年，大学毕业后，符拉基米尔佐夫被留在蒙古语教研室。为争取教授称号，他把理论工作与外出调查研究结合了起来。1911年，博里斯·雅科甫列维奇再次被俄国中东亚研究委员会派到西蒙古去进行六个月的巴伊特语研究。出差到杜尔伯特人和巴伊特人处同人民进行亲密的接触，在年青学者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他把自己今后的全部活动都献给了研究蒙古人的生活。1912年被派往巴黎和伦敦后，博里斯·雅科甫列维奇继续关心到蒙古所发生的一切。他写道：“在蒙古的生活逐事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里的生活惊心动魄地吸引着我”。民族解放运动和建立自治蒙古的问题引起他的兴趣，沙俄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使他生气。早在出国前符拉基米尔佐夫即曾活跃地参加把蒙古的情况介绍给俄国公众的演讲。1913年，符拉基米尔佐夫写信给阿·瓦·布尔都科夫说：“须知在俄国根本没有人知道蒙古，没有人对它感兴趣……我们做了整整一冬力所能及的事；写文章，作专题报告，同政治活动家进行会谈，等等”<sup>②</sup>。对蒙古、对蒙古人、对蒙古学这一学术部门的热烈兴趣，乃是符拉基米尔佐夫的突出特点。

---

<sup>①</sup>符·姆·阿列克谢耶夫：《悼念符拉基米尔佐夫院士》，载《苏联科学院通报》，1931年，第8期，第16页。

<sup>②</sup>符拉基米尔佐夫写给蒙古学家阿列克塞·瓦西里耶维奇·布尔都科夫的信承布尔都科夫的女儿泰西雅·阿列克谢耶芙娜·布尔都科娃交给本书编辑部，谨此致谢。

在巴黎，博里斯·雅科夫列维奇到民族图书馆着手研究，记述了该馆所藏蒙古书籍和手抄本。他还听了法国最大的语言学家迈耶、贝迪和汉学家—蒙古学家伯希和的讲课，伯希和被誉为声望很高的东方学家，他受人们推许的功绩在于他利用了前所不知的汉文资料来说明13—14世纪蒙古帝国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在伦敦，符拉基米尔佐夫着手研究大英博物馆的蒙文藏书。就这样，俄国蒙古学家调查研究了欧洲所收藏的最重要的蒙古书籍和手抄本。

1913年回国后，符拉基米尔佐夫第三次前往西蒙古和北蒙古，在那里住了二年半。他同蒙古人一起游牧，遍历蒙古全部西部地区，记录下了大量当地民间口头创作，发现了蒙古叙事诗文学。在旅行时，还跟过去一样，他记下详细的日记。可惜的是，据记述他的生平的一篇传记中说，这些“内容丰富的”大量记事，他的日记，不仅未曾问世，而且在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遗失了。博里斯·雅科夫列维奇日记的丢失对蒙古学特别不幸，因为，根据知悉这些日记的人们的意见，日记中包含有不少有价值的观察到的情况以及蒙古人生活中最有趣的事实的记载。

1915年夏天，符拉基米尔佐夫返回彼得格勒后，开始为彼得堡大学准备讲课。1915年9月，他头一次试讲了《西蒙古的文字与文学状况》和《西蒙古的部落与方言》的课程。就这样，开始了符拉基米尔佐夫的教学工作，直到去世为止，他的教学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1915年11月，讲完头一次试讲的课程后，博里斯·雅科夫列维奇被批准为副教授，开始讲授蒙古语方面的课程。他选了《蒙古语变化的原因》为最初讲课的题目。当年，听蒙古语课的大学生不多，可是，如符拉基米尔佐夫所指出的，他们全都很好地听课。

除在大学里任课外，符拉基米尔佐夫同时还到科学院亚洲博物馆着手工作，着手记述蒙古和卫拉特抄本，该馆所藏的抄本是欧洲（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珍本。在这些年代中，符拉基米尔佐夫刊印发表的著作还不多。在1912—1916年中，他总共发表了四篇论文，但是在这些论文中显示了他对蒙古语言、民俗学和民族学的精湛、透彻的研究者。

1917年夏，符拉基米尔佐夫前往阿斯特拉罕，在那里应卡尔梅克公众的邀请，他作了蒙古学方面的演讲。其中若干次演讲，是在巴珊特——今卡尔梅克自治区西部地区的首邑举行的。

符拉基米尔佐夫同情地迎接了十月革命。在一封信中他以下面这段话表明了他所持

的爱国主义立场：“在我看来，现在每个人都应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力所能及地努力做自己的事；如果说现在工人们被召唤到机器旁去，那末我们所应负的使命是书本和笔。对于每一个俄国公民来说现在最需要的是：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做自己的事；因为祖国最需要的是劳动”③。博里斯·雅科甫列维奇以自己的工作完全履行了这段话。正是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里，他准备了二十年代初付刊的他的若干著作。

在十月革命后创立的彼得格勒地理学院里，符拉基米尔佐夫为民族学专业的大学生们讲授了普通语言学方面的课。他是卫国战争刚结束便创建起来的列宁格勒现代东方语学院的创始人与教授之一，他在该学院领导了蒙语系以及根据他的倡议开办的蒙语讲习班，这个讲习班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从蒙古本民族劳动青年的代表中培养蒙古学学术干部的场所。符拉基米尔佐夫在所有这些高等院校中的富有成果的教学活动一直继续到去世为止。

符拉基米尔佐夫的学术活动基本上是在伟大十月革命以后展开的。从1920年起，符拉基米尔佐夫积极地参加由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发起创立、并有他直接参加的《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工作。

力图把蒙古民间创作与叙事诗作品介绍给广大苏联公众，符拉基米尔佐夫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了自己的若干篇著作。1923年，他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9年——当选为正式院士。

革命后，20年代时符拉基米尔佐夫曾两次出差蒙古人民共和国。1925年，他调查了肯特山和克鲁伦河上游地区。1926年，他曾去到乌兰巴托，还到过北京。这几次旅行都是由刚建立的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蒙古委员会发起组织的，该委员会后来转归苏联科学院管辖。符拉基米尔佐夫是蒙古委员会工作的经常参加者，1925年，他领导了前往蒙古的民族志学—语言学工作队，在此后几年中他积极参加蒙古委员会所刊布的出版物的准备工作。由于符拉基米尔佐夫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的结果，他发表了关于库伦、库伦地区和肯特山地区的民族志学—语言学研究的很有价值的报告，还发表了论文《喀尔喀卓克图台吉石刻》以及其他也很值得注意的历史—语言学研究论文。1929年，他预想中的巨著《蒙古语与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的第一编出版了。这部书不仅在蒙古语研究

---

③1917年4月25日给阿·瓦·布尔都科夫的信。

史上具有巨大意义，而且是学术发展上的划时代著作之一。

博里斯·雅科甫列维奇一生的最后几年献给了创造一部内容丰富、现在成了经典性的蒙古史著作，这部书是在他过早地逝世后出版的。他是病死的，一直没有停止过工作。8月16日，去世前一天，他写完了《蒙古人的社会制度》第三篇。1931年8月17日早晨，博里斯·雅科甫列维奇在自己的日记上写下了最后的记事：“头痛，写作”④。到了晚上，他已经去世了。他死在47岁上，正是创作力旺盛的岁数，他为蒙古学作出了大量的工作，在他之前半个世纪中人们没有作出过这么多的工作。符拉基米尔佐夫在其一生的一个劳动片刻中写道：“无论如何，我在生活中还是最喜爱，也最关心东方学”⑤。我们时代最卓越的蒙古学家的整个一生充满了这种爱科学的精神。

（余大钧译自《蒙古族的语文和历史》（论文集）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58年版，第3—8页。）

---

④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人的社会制度。蒙古游牧封建主义》，列宁格勒，1934年，第六页。

⑤1920年7月5日给阿·瓦·布尔都科夫的信。